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卡尔·马克思， 人类学家

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美] 托马斯·C. 帕特森 著

何国强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1世纪人类学文库

卡尔·马克思， 人类学家

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美] 托马斯·C. 帕特森 著

何国强 译

许韶明 校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 - 2013 - 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马克思, 人类学家 / (美) 帕特森
(Patterson, T. C.) 著; 何国强译. -- 昆明: 云南大学
出版社, 2013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

书名原文: 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ISBN 978 - 7 - 5482 - 1830 - 2

I. ①卡… II. ①帕… 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
论 - 文化人类学 - 研究 IV. ①A81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765 号

卡尔·马克思, 人类学家

[美] 托马斯·C. 帕特森 著

何国强 译

许韶明 校

责任编辑: 蔡红华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830 - 2

定 价: 40.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Thomas C. Patterson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by Berg Publisher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本书根据伯尔格出版社2009年第1版译出，翻译出版获得作者授权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总序

中国的人类学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建，到 90 年代以来，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

2. 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期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

法，而且，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达七十余次。这些高层次的研讨会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

3. 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绩。2002年1月，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为新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全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如中山大学有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相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分别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云南大学先后两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村寨调查，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村寨调查丛书。中国的人类学界必将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中国（昆明）的召开。

4. 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及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人类学是改革者的学科，人类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学科。费孝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人类学家参与的艾滋病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云南大学人类学家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中山大学对江西、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的社会评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为了适应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和本土化发展的需要，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学者编写了一套反映当代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系列教材《21 世纪人类学文库》。厚积薄发，正是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使今天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蔚为大观。这一套教材凝聚着编著者的心血，而长期以来许许多多人类学者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日学科发展的汪洋大海，则是这一套教材编写的不竭源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如果说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为期不远的话，我们愿这一套教材的出版能引导更多的雏凤走上对人类学的不懈追求之路，催生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21 世纪人类学文库》编委会

2005 年 10 月

献给朋友、同事和学生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 and 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暂时大致还没有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象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中文版序

记得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人类学”这个术语。我原本报读的专业是物理学，憧憬着毕业后以搞工程为职业，可是我要学的课程，如数学、力学等大都都很抽象。学校要求文理科学生在高年级的时候互选对方的一门课程，取得成绩才能毕业，于是我选了“人类学基础”，这样做自己不仅可以得到一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分，而且排课时间也利于我避免课程冲突。早晨，我可以先上一门专业课，在9点半钟以前赶到另一幢教学楼再去听选修课。在学习“人类学基础”的过程中，老师循循善诱，我逐步认识到这门学科的图景，开始观察人际关系，通过比较各种行为、态度来界定人类自身，并借助于回溯人类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种种物证来了解它们与人类生活的联系。这门课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对遗传学和古代史的兴趣陡然上升，而我本来就觉得数学索然无味，现在则更加提不起兴趣。大学的科层制僵化、刻板，如何帮助我洞穿这两门看似森严的学科屏障？在摸索和尝试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延续自己的学习兴趣，只有主修人类学才行。于是我放弃了数学，改弦更张，专攻人类学。在随后的两年中，我继续提升对人类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兴趣，在更加广阔的视野星空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磨砺学习意志。与此同时，我逐渐学会了从世俗的维度去欣赏人类营造的环境及其意义，尝试以交互关系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史与人类自然史的作用，并且从对人类

自然史的认识中，更加正确地理解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轨迹。

长期以来，我对人类学的整体主义观点颇感兴趣，我坚信“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哲理。美国人类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与研究倾向：一是整体的倾向，一是局部的倾向。整体观的持论者主张加强各个局部研究间的交流，以此来构架整体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尽管这些局部研究指向不同的领域，依据不同的方法论，采用不同的研究资料，然而，局部观的持论者则认为整体不是各个局部之和，有些局部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他们以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类学进行二级划分（例如，考古学、民族学等），局部论者经常不是含蓄便是明确地说，他们对于人类学的某一特定分支领域内的知识源泉享有优先接近或独占的优势，因此，局部人类学是探索人类生存状况的唯一途径。针对人类学上的整体主义和趋于整体主义的倾向，以及与美国人类学整体主义相背离的局部倾向，美国学者埃里克·沃尔夫曾认为它们是“同一学科内都把自己称作‘人类学’的不同领域及分支”。关于人类学整体和局部两种倾向的辩论，在过去的 50 年里，对我所从事的人类学专业环境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场辩论不仅仅影响了人类学专业环境的形成，还推动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出版，例如，马克思的日记、信札和书摘以及翻译作品。尽管要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文版、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的翻译任重而道远，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这些已出版的马克思的日记、信札、书摘以及翻译作品，为我们审视人类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坦白地说，1961 年我刚去到秘鲁搞田野发掘时，给自己提出一个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和人类学有什么联系？”随着以前从未公开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越来越多地面世，我再次回首阅读这些作品时，不断地发现 50 多年前自己的认识并未产生飞跃，旧的疑团仍然存在。我写作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及其分支的关系不是在闭门造车，我做这件事情与其他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托洛茨基思想”的出版物为基础进行研究一模一样，我相继出版和发表了诸如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的

人类学或考古学”的一些作品和文章，尽管我一直试图回答最初的那个疑问（“马克思和人类学有什么联系？”），并且至今没有满意的答案，我还是执着于这个问题。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认为，总体量变中存在着部分的质变，我的研究过程没有完结，只是上一个阶段的休止符，本书就是总体成果中的一部分。

2011年，当何国强先生与我接洽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事宜时，我再次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①。能够再度与这位中国同行兼朋友合作是我深感荣幸的事情。何国强先生本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来翻译这本书，他还筹划了此书的出版事宜，让我有幸再次见证了两位中美学者个人思想的结合。在此，我愿意对何国强先生所作出的努力表达深切的感谢！

^① 2006年译者写信给作者帕特森，询问他的前一本著作《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翻译成中文的可能性，当时帕特森回信表示发自内心地高兴。顺便说，凡译者所加脚注，均以“译注”注明。——译注

译 序

在当代探索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文库中，人们总会看到一种现象：许多主题新颖、观点造势、壮心不已的作品，只给读者片刻的满足，却留下无尽的遗憾。其原因固然很多，主要是好的选题没有被充分利用，譬如，在开掘的深度、缕析的精细程度和拓展的广度上都打了折扣，甚至于蜻蜓点水、旧调重弹、徒具形式。人们也看到另一种现象：造诣较高，在深度、广度和精细程度上均可圈可点的作品斗艳争妍，像一面面镜子，共同映衬出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风范。

《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当属后一种现象。此书探讨了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来源，如从青年马克思选修的大学课程、参加的讲座入手来追溯他的悟性培养和知识训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述中去发掘养料，如从《资本论》中廓出“类存在物”与社会关系总和等问题结，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归纳或引入冲突与控制的理论。此书以宽广的视野解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非西方社会的论述，从专业出版物或主流媒体之外的叙事档案和个人传记来剥离他们的人类学思想，而不是一般地联系摩尔根、菲尔、梅恩、拉伯克或柯瓦列夫斯基，简单地分析《民族学笔记》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作者帕特森是一位人类学家，治学严谨、学富五车。此书耗费了多年

的光阴，经过不断地提炼观点、多方挖掘材料、集思广益、缜密构思、精心雕琢，到他 72 岁时才付梓。文本的转换另有一番艰辛。译者在潜心阅读原著并旁及相关论著，反复推敲与玩味的过程中不觉枯燥，每每为新颖的观点、深刻的内容、严密的逻辑、朴实的风貌所折服。掩卷沉思之余，总有一番心得，积少成多，印象日益清晰：它的确是一本好书，立论新颖、资料扎实、论据充分、对话点集中，传递了许多富于启迪的信息。试以参考文献为例，精选书目达 510 条，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占 17.65%（约 90 种），引出当代许多相关成果。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帕特森为马克思勾勒出一幅画像，他复活了马克思作为人类学家的精神生命，让逝者实至名归。

本书首尾呼应，开篇说“卡尔·马克思是一位人类学家”，末章又说“马克思的确是一位人类学家”。全书围绕着这条伏线布局，层层展开叙述。这个命题得以成立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马克思相信人类是社会的产物。人类不断地继承与创造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推动着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既用大尺度审视了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廓清了肉体与精神、自由与必然等范畴，揭示了劳动（实践）作为中介的作用，评估了剥削、异化和支配对个人濡化的作用；又用小尺度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及其历史使命，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冲突与结局。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侧重的是社会关系，而不是体质、文化和语言，尽管也关注这些内容。

第二，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不是晚年才有的残片，而是他长期形成的知识训练，上承启蒙时代的思想种子，下启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这句话无疑把特定时代的人类情怀、阶级诉求和文化模式当作时代的精神。马克思立足于对特定时代的认识提出问题，扬弃争论，寻找思路，评判人类状况的出发点，延续了人文观念的整体性，丰富了他的人类学思想。

^① 参见《第 179 号“科隆日报”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1 页。

第三，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依托，获得了三种特性：强大的理论穿透力、深厚的历史感和严整的体系。为了通俗地说清道理，这里以房屋为例：生产方式是整幢房屋的基础，承担了整幢建筑的重量，房屋的修葺和重建（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也要由它来决定；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等冲突与控制理论犹如梁、檩、椽、柱，彼此搭配就撑起整个屋宇；人类的肉体特性与精神特性是砖、瓦，与其他材料黏合，密封和充实了整个屋架。上述各项要素共同揭示了特定生产方式下的人类活动，指明人类走向大同社会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依托，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互相取代。

第四，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具有典型的学科指向和规范。它以科学预见为导向，以历史事实为起点。马克思注意到人类诞生于社群，社会关系为其本质，人类具有同一的体质结构、服从同一的智力原理、拥有同样的理想追求，这些特性通过具体的族群得到不同的表现，因此科学规范时隐时显，呈结构性交叉。他的研究不是以原始社会为起点，而取“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的模式，从高级社会回溯到低级社会，逐级汲取经验材料，不断地提炼结论、蒸发思维，达到较高层次的抽象，在思维中完满地把握对象，揭示出人类的同源性、生物本源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交换和实践的中介作用，文化的世代积累，语言和意识的关系。

第五，马克思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兴趣始终不渝，他预告了现代人类学视为根本的问题（参见本书第6章），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代的各种不同的劳动关系，各种技艺、科学、工艺、工艺学等的发展，人类的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等。界定了认识对象等于确定了学科的范围，我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梳理出上述问题，如人类事实上的分裂和可能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社会发展的阶段（初级分类）、国家的消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直到晚年也没有放弃这些问题的

^① 参见《〈经济学手稿（1857—1858）〉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6页；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研究。

第六，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最初“具体”以感性、经验的形式体现，后来被赋予在思想中把握对象的每一个特性、每一方面的含义。人类状态是个抽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具体化为生产关系、劳动分工、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产力）等形式，还把原始公社视为可以验证的社会组织，并且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财产的本质等。经济是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马克思运用了大量经验材料来具体分析，给予经典的表述。即使在1879—1882年的《民族学笔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性。

第七，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欧洲中心论是对立的，而此论乃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的观点。马克思主张人类社会由不同的文化传统构成，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他毕生追寻“亚细亚生产方式”，晚年时慢慢弃用了这个概念，而用“农村公社”的概念来代替。两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有很大的重叠性，涵盖了人类学家的许多田野观察经验，只不过他们有意回避这两个词，与马克思保持距离罢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补充阐述。

帕特森给马克思画像时没有忘记描绘恩格斯的光辉。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也是浩瀚而深邃的，绝不限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① 帕特森提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上首部关于城市民族志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从文化的视角丰富了人类起源的学说，《马尔克》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带有浓厚的人类学成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描述的两种生产的再探讨，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延至《资本论》的深入分析，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版序言的经典表述。在《反杜林论》等著述中，还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人类学观点，如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探讨了东方国家的起源、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属性等问题。

本书以马克思命名是无可厚非的，在这个名字之下也包括了恩格斯。

^① 参见[美]诺曼·列文《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林强译，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交 40 年，两人患难与共、彼此交流，磨砺思想、精诚合作。例如，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马克思帮助他完成该书的第二部分“经济学编”。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评论时吸收了恩格斯的某些观点，如恩格斯根据自己对亚细亚国家的理解，将东方帝国划分为政府组织（进而细分为财政、军事和公共三个部门），又从气候和土地条件出发，指出水利灌溉和供水系统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古老公社的解体主要不是公社内部的分工，而是外部交换，由此导致财富差别，进而产生商品交换，又再导致商品生产，引起整个社会的分工。这时候公社的躯壳还保留着，但已蜕变为次生形态的公社。当马克思力所不逮时，还曾请恩格斯代笔。

西方人类学诞生以来，从不同角度做出建树的学者组成不同的学派。^①传统的编年史家通常将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游离于学科框架之外。帕特森反其意而行之，提出马克思有无独特的人类学思想的问题。任何人对于这个问题都可以发表意见，但最好排斥情感与政治偏见，同时要清楚各自的预期：你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他是革命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还是一个人类学家？同样的材料，预期不同，引申的含义也不同。但也容许几种预期并存，因为人的思维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由几层并列的本质构成，层次之间是相通的，彼此间是支撑和制衡的关系。其实，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并不矛盾。分析家只需找准层次，调动信息流，汇聚成证据，讲清楚道理即可。帕特森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涉足的很多领域去挖掘，拿出足够的材料，当他说“卡尔·马克思是人类学家”时，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人类学作为一个大系统，内含经验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两个子系统。经验人类学亦称实证人类学，出现于启蒙时代，它的初级表现是体质人类学，19 世纪上半叶出现社会文化人类学，继而出现考古学，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语言人类学。博厄斯建立学科体系时把上述四个分支纳入，缔造出

^① 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封底语，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1998 年第 2 版、2004 年第 3 版、2013 年第 4 版。